

王志松 编

文化移植与方法

东亚的训读·翻案·翻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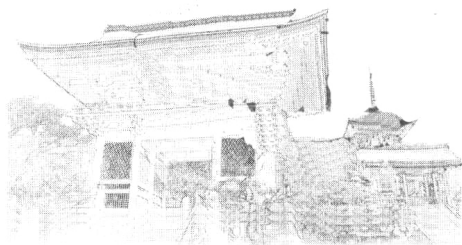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项目的资助

文化移植与方法

东亚的训读·翻案·翻译

王志松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移植与方法:东亚的训读·翻案·翻译/王志松
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495 - 2562 - 1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化交流—东亚—文集
IV. ①G131.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1010 号

出 品 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周 丹

装帧设计:陈 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20.75

字数:240千字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前言

王志松

随着全球化经济浪潮带来频繁的文化交往,文化冲突也不断增多,异文化交流与翻译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日益受到重视。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文系以“东亚中的日本文学:训读、翻案与翻译”为主题于2011年10月16—17日举办了国际学术前沿研讨会。本次会议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2期)以专栏的形式选择发表了会议“训读”单元的文章。

“训读”是一种将汉文转换成日语读音和日语语法的方法。有关“训读”的研究过去主要限于日本国语学领域,但近年“训读”问题跨越语言学,也受到思想、文学和翻译等研究领域的关注。究其原因有二:其一,随着东亚在经济上的崛起,东亚的传统文化重新受到评价,其中包括对东亚地区汉字文化的再认识;其二,与上述问题相关,经济的崛起又使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因此尽管承认汉字文化圈,但各国都强调各自的文化遗产和独特性。要究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这种关联性和差异性,“训读”(包括朝鲜半岛的“悬吐读法”和越南的“纯喃音”)是关键所在。所以,“训读”不仅是汉字注假名的读音问题,也包含经由训读的汉字再造、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语言转换的翻译、注释的再创造、外语学习的方法论等问题;同时还包含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外来文化输入的机制、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创生及其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需要展开多角度和跨学科的研究,该专栏论文的发表对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无疑会

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该专栏所发表的论文由于尽量保持各篇文章原初风貌,有的是日语论文,有的中文论文包含不少日语引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语学界以外的读者阅读。因此,为了向一般读者更充分地展示会议成果,特地将日语论文或日语引文全部翻译成中文,加上其他两个单元的论文结集出版,同时收入几篇与会议主题相关的论文。

本文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训读与汉字文化圈”。中村春作的《“训读”论开拓的新视野》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训读”与东亚地区的文化理解、文化接受以及知识体系形成之间的关系。金文京的《东亚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则考察了日语“训读”的起源,认为此种语言现象不限于日本,广泛见于汉文化圈,并影响到各国的世界观。马俊的《从〈古事记〉序文看太安万侣如何突破汉字固有表达的重围》、赵力伟的《作为注释的训读——以〈蒙求和歌〉的训读为中心》、佐藤正光的《关于大江千里〈句题和歌〉中唐诗诗句翻译的观点》和郑文全的《白隐与寒山诗解读——以〈人问寒山道〉为例》则分别以四个具体案例探讨古代日本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时,是如何通过训读阐释、翻译汉诗、汉文,建构日本独特的文化的。王志松的《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训读”与东亚近代翻译网络形成之一侧面》从相反的角度考察“训读”的日译汉问题。该文分析了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的“训读”内涵,以及与其翻译、新文体写作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训读”在近代东亚翻译网络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翻译与翻案”。王晓平的《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前翻译”——翻译者的文字学功课》从文字学和版本整理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问题。该文认为,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存在一个汉文学和假名文学(和文学)相交叉的中间地带,即用变体汉文撰写的作品。要翻译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全部翻译流程的特点。周以量的《日本近世文学与“翻案”》从中国诗学传统的角度梳理了“翻案”这个术语的渊源,并将其置于日本文学的语境下进行探究,通过都贺庭钟《英草纸》的具体分析探讨了“翻案”与近世文学之间的关系。

卢俊伟的《浅井了意〈伽婢子〉中的三教一致学说》、李强的《〈苦闷的象征〉汉译研究——形式·内容与本体性》、李青的《“学校教育之辅助”——以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为中心的考察》、梁艳的《曲笔针砭时弊——陈景韩译〈^{哀史}逸犯〉动机考》、国蕊的《从〈银山王〉到〈白云塔〉——陈冷血翻译小说文体和叙事结构初探》和张冲的《欧阳予倩对谷崎润一郎戏剧的译介——以〈空与色〉为考察对象》则分别以个案探讨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或转译自日语的文学作品的种种面相,以及这些翻译与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第三部分是“东亚文学与文化越境”,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探讨东亚地区的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两方面的论题。其一是张哲俊的《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提出要重视第三种比较研究文学关系,即研究重点应当从文本关系转移到物质事实层、观念知识层和复数的作品层,由此接近文学交流的实际状况。其二是郑炳浩的《从朝鲜半岛的“日语文学”看朝鲜文艺作品的翻译及其政治学》、祝然的《论室生犀星〈大陆之琴〉中的殖民话语及其颠覆》和单援朝的《“满语假名”考》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日本在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文化扩张/侵略及其受挫的问题。

东亚的文化和文学交流是在东亚这个特定地区和特定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独特而丰厚的翻译实践。如何评价这些翻译实践,如何认识这些翻译实践与东亚地区的文化·文学生产的关系,不仅关涉到推进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对于建构新的知识平台也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集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和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北京师范大学985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目 录

训读与汉字文化圈

- “训读”论开拓的新视野…………… 中村春作 3
- 东亚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
- 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 金文京 15
- 从《古事记》序文看太安万侶如何突破汉字固有表达的重围
- …………… 马 骏 29
- 关于大江千里《句题和歌》中唐诗诗句翻译的观点
- …………… 佐藤正光 46
- 作为注释的训读
- 以《蒙求和歌》的训读为中心…………… 赵力伟 63
- 白隐与寒山诗解读
- 以《人问寒山道》为例…………… 郑文全 77
- 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
- “训读”与东亚近代翻译网络形成之一侧面
- …………… 王志松 94

翻译与翻案

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前翻译”

- 翻译者的文字学功课 王晓平 119
- 日本近世文学与“翻案” 周以量 140
- 浅井了意《伽婢子》中的三教一致学说 卢俊伟 170
- 曲笔针砭时弊

- 陈景韩译《^{哀史}之一节逸犯》动机考 梁 艳 183
- “学校教育之辅助”

- 以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为中心的考察 李 青 198
- 从《银山王》到《白云塔》

- 陈冷血翻译小说文体和叙事结构初探 国 蕊 219
- 《苦闷的象征》汉译研究

- 形式·内容与本体性 李 强 231
- 欧阳予倩对谷崎润一郎戏剧的译介

- 以《空与色》为考察对象 张 冲 248

东亚文学与文化越境

-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 张哲俊 267
- 从朝鲜半岛的“日语文学”看朝鲜文艺作品的翻译及其政治学 郑炳浩 282
- 论室生犀星《大陆之琴》中的殖民话语及其颠覆 祝 然 293
- “满语假名”考 单援朝 305

训读与汉字文化圈

“训读”论开拓的新视野

日本广岛大学 中村春作

一 日本的“他者”经验与“文化”的翻译

(1) “文化翻译”的课题

文化人类学中有“文化翻译”的课题。青木保在以此为书名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化人类学者在“文化翻译”中所面临的难题及解决问题的困难(《文化翻译》1978年)。青木认为,对某种特定的表达或语言进行“翻译”时存在两种方式,即“合乎逻辑的、结构性的理解方式”和“直接的、隐喻性的理解方式”,且因为两者是“以绝对无法割裂的形式共同出现”的,故而“在文化的翻译中,人类学者意识到自身是二元性的存在”。青木根据自己在泰国寺院修行的经历,阐述了将泰国本土的精灵之说及特有的宗教用语转换到日语文脉中的困难,并执著地追问“文化翻译”究竟是否可行(“然而,总有些什么保留在理解之外”)。他还以通过异文化解读(此处指文化人类学者)的解释(误读)、“禁忌”与“信仰”之类的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空间里怎样产生出新的生命力为例,说明了“文化翻译”过去所遇到的问题。与此自相矛盾

* 本稿以中村春作、市来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共同编写的《“训读”论——东亚汉文世界和日语》(2008年),及《“训读”论续——东亚汉文世界的形成》(勉诚出版,2010年)中的序论(中村执笔)为主,重新归纳而成,具体论述详见原书。此外,近有拙稿《以训读为名的“翻译”》(《文学》,2011年5、6月),论述了近代日本的西方思想翻译和“训读”文体形成的关系,敬请参照。

的是,青木保也力图说明,只有通过“文化翻译”这一“bricolage”(手工作业),人类才能正视异文化(自身文化)。^①

“文化翻译”这一课题,及其所包含的困难和可能性,绝不仅是专业的文化人类学者才会面临的问题,也不仅是由特定的知识权威人士来分析的问题。当某种新型文化自外界输入并被内化,当人们意识到它已变成“自己的东西”时常常会遇到上述问题。若考虑到所有文化大都具有“文化复合性”的话,则这个问题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是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长期与外来文化保持紧张关系的日本,弄清“文化翻译”是如何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对于理清日本文化变迁的状况和真正的文化难题之所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日本,对于“被翻译过来的文化”的“外来性”的认识及排斥,很多时候直接反映在对自身文化的论述中。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回顾其“文化翻译”的发展状况,也能够使日本文化的面貌清晰地浮现出来。

(2) 作为问题的“汉语”与“和语”

回顾历史,在日本,“文化翻译”这一课题与自我意识的形成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问题,最明显地表现在“和语”与“汉语”的交流中。日本与中国、朝鲜的交流时间最长,在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在文化的翻译、交涉与摩擦方面首先要面对的课题就是“汉语”问题(或者说是怎样在“内部”定位“汉语”的问题)。

尤其是在构建近代国家,创造“国语”时,人们强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居宣长的国学被称为近代“国语”的起点,这个问题最初就是在其国学中被提出来的。子安宣邦指出,宣长对“大和语”的发现是以汉文书写文本为前提才完成的,但他却以事后说明的方式隐瞒了这一发现的过程,所以是本末倒置的理论的产物。^② 与“汉意”相对抗的“大和魂”、“大和语”具有优越性这种主张,是经过模糊“训读”这种人

① 青木保:『文化の翻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41—85頁。

②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第63頁。

为的过滤装置后产生的。而“汉语”和“和语”的矛盾,在明治时期,即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时期,变得更加突出。

如此一来,在近代日本成立时期,“文化翻译”的课题便向我们提出了“汉语”究竟是什么(曾经是什么)的问题。与此同时,那是一个新造汉语大行其道的时代。前田爱曾从大众化的儒学文本的接受及素读体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月落乌啼式的书生”(好吟汉诗以寄托清高志向的书生)——即明治初期知识分子——的素养。^①正是这一新的知识阶层创造了大量的新造汉语,并以此为媒介拓展了新的知识天地。“训读文”、“汉文体”文体,便是在此过程中占据了日语世界的重要位置。“汉文”被市民阶层广泛学习,是在江户后期,更确切地说是在明治以后的事情。而汉文成为大众阶级的知识修养,实际上是在十九世纪。“训读”与这种近代知识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因此,即便到了昭和时期,频频被知识精英们回忆起来的,仍是“汉文”及其“读法(素读)”等曾塑造自己“修养”的记忆。在与哲学家田中美知太郎进行的“所谓修养”(『中央公論』1964年6月)的对谈中,小林秀雄谈到:“所谓修养的传统,是不经意间重新兴起的。正因为有汉文修养(指的是西周等人,笔者注),所以他们翻译也做得好”^②。彼时他回想起的,恐怕也是训读创造的日语化的“汉文”世界以及学习“汉文”的旧制高中的知识世界吧。在近代日本,当人们意识到周围的文化氛围日益稀薄时,总是会不断对这种“修养”进行确认。“关于汉学振兴的决议案”于大正十、十一、十三年(1921、1922、1924年)连续在众议院以全票通过,这是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文化危机意识息息相关的。“汉文”与训读这一“翻译”形式与“素读”这一身体学习经验的记忆,共同在我国的文化修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需要再次确认的是,“训读”无疑是用和语进行的“翻译”,训读文中说的“从头读到

① 前田爱:『近代読者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166—210頁(初出は有精堂出版1973年)。

② 小林秀雄、田中美知太郎:『教養ということ』『中央公論』第6号,1964年,第215—223頁。

尾”,无非是阅读用和语重新叙述了一遍(虽是人为,却隐蔽了“人为”性)的“汉文”而已,这些是在近世后期到明治初期儒教修养发生蜕变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在思考近代日本“修养”形成的历史过程时,江户后期以后“训读”作为一种所谓的“知识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思想史上导致这种制度产生的契机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再次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思考“文化翻译”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能引导我们走向更本质的问题——对我们而言,“翻译”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呢?

(3) 讨论“训读”意味着什么

讨论“训读”,对我们日本人而言,就好比暴露关乎生存根本的“文化翻译”这一课题,也是检视我们生命内部的“汉语”与“和语”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明治以后围绕“训读”展开的多次讨论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对“语言”的探讨,往往是促使一种文化反省自我、认识自我最敏感的催化剂。对日本人和日语来说,这一点突出表现为与“汉字”的关系以及距离意识。

关于日本人同“汉字”的关系,高岛俊男曾做过这样一个精妙的比喻。

汉字对日语而言是一个棘手的重负,而且是一个深入骨髓的重负。它原本就不符合日语的体质,无论经历多长时间也融不在一起。

然而,若去除这一重负,日语就会退化。贸然行事甚至会导致日语的死亡。

确实,这个重负没少祸害日语,但若没有它,日语也寸步难行。这是段孽缘——此处的“腐れ縁”一词,“くされ”是和语,“縁”是汉语,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词。日语本身就如同“腐れ縁”这个词,是由和语与汉语混合构成的。这种

关系无疑是一种“孽缘”。^①

“和语”与“汉语”的“孽缘”这一比喻可谓精妙。在把“汉语”转换成“日语”的过程中产生的“训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近代日语的词汇、文体与（来自西方的）翻译新词，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近代人的思维，可以说已经内化为一种无法分割的“和汉”混合物，存在于我们体内。

因此，思考日本“训读”传统的来源和现状，并不单单是考察近代以后的训读法（翻译技巧）的历史，而是思考与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知识”的存在方式直接相关的问题。日本明治以后有关“国语”的讨论往往聚焦于“国语国字问题”，大概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高岛所说的“孽缘”这一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被不断追问，而这一问题又与我们的认识框架 = “学问”的重构密切相关。

（4）开拓“训读”论

近年来，日本出版了很多关于“汉字”、“训读”的启蒙书。仅笔者所见，就有加藤徹的《汉文的修养——谁创造了日本文化？》（2006年）、小驹勝美的《汉字是日语》（2008年）、笹原宏之的《训读的故事——汉字文化圈中的日语》（2008年）等面向大众的新书陆续出版。此外，还有《古典日语的世界——汉字创造的日本》（2007年）这样的大学教材。它们各自拥有众多读者。这些新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汉字”、“汉文”、“训读”视为仅由日语研究者、训注学会、或儒学史研究者研究的所谓“学界”内部的话题，而是像它们的书名或副标题表明的那样，尝试把问题重置于更开阔的视野下。“汉文”或“训读”无疑正被重新定位为构成日本文化的重要因素。在《古典日语的世界——汉字创造的日本》一书的序言中，编者梳理了近代以后日本的国语教育偏重“和文”的历史，指出：

① 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人』，東京：文藝春秋，2001年，第245—246頁。

现在仍然制约着我们的,古已有之的“固有民族=‘日语’文学”这一“古文”观,不过是近代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从“这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文明’化是在室町时代形成的”的历史学观点来看(義江彰夫《日本通史Ⅰ从历史的曙光到传统社会的成熟》,山川出版社,1986年),这种“古文”观也不过是伪装成自古以来的固有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文明”罢了。我想摆脱这种观念,根据读写的实际情况,重塑对古典世界的认识(神野志隆光)。^①

此处提及的“读写的实际情况”,指的是完全由汉字、汉文构成的“真实的古典日语的世界”。的确,摆脱被“近代知识”的制度所限制的视野,循着细节重新认识现实中(日本)的古文、古典文化的世界,正是当下需要的。这也正是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相关的本质性问题。

然而,我认为“训读”论能够开拓的问题领域并不止于此。通过设定“训读”论的问题领域,或许能够就东亚汉文世界的形成这个更大的问题深入探讨下去。

二 “训读”论开拓的东亚汉文世界

(1) 作为方法的“训读”论

探讨“训读”,不仅是把近世到近代的日本文化的真实面貌从“近代国家”这一框架中解脱出来,重新加以把握,更应该把它作为弄清东亚汉文化圈形成过程的一条线索来思考,而且还应该循着这条线索将问题阐发开去。我认为应该把“训读”论作为一种文化翻译的“方法”来理解东亚汉文世界的发展。难道不应该将“训读”论重新定位为

^① 東京大学教養学部編:『古典日本語の世界—漢字がつくる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Ⅳ—Ⅴ頁。

“文化复合”世界中的“翻译”论的重要议题吗?《训读的故事——汉字文化圈中的日语》的终章“东亚世界的训读”,不仅涉及了韩国、越南这些中国周边地区的“训读”问题,还涉及中国本土的“训读”(或者类似训读的语言现象)的情况。另外,金文京在最近出版的著作《汉文和东亚训读的文化圈》(2010年)中,也从同样的视角出发,尝试重新对“训读”进行定位。当然,狭义上的训读,即标注读音顺序、用训读文体标记的日本式的“训读”方法,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共有的。但在以汉字表记体系为基础,通过各种手段构建自身语言或自身文化(以及自我文化意识)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尽管古代朝鲜有类似于“训读”的读法存在的迹象,但其后经历“吏读”、“口诀”等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文世界。这样的汉文世界与日本近世的汉文世界有哪些异同点,到目前为止,这类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另外,这样的视角实际上也是对“汉字=中国”这一大前提的质疑。书法家石川九杨主张通过重新审视汉字文化来“客观审视东亚各国”。他认为探究汉字的文明化这一历史现象与质疑“中国”这一不言自明的框架密切相关,指出“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通过汉字把使用不同语言的多个小国统一起来形成的国家”,并阐述了这种想法的重要性。^①此外他认为不应以代纪更替的国家为单位思考历史,而应该从语言(汉字、汉文)怎样被共有,又是怎样催生出个别语言文化这一点来看待历史。他主张通过不断研究汉字、汉文来客观审视东亚国家(依附于国家的文化理解)。

石川把“中国”重新定位为“通过汉字把使用不同语言的多个小国统一起来形成的国家”。想想历史上中国曾不断被外族统一然后改朝换代,清朝的公文上汉语和满语并用的现象,不难与他的观点产生共鸣。“训读”论也应该超越仅仅是“日本独有的”技法这一成见,发展为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比地、复合地弄清东亚的汉文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方法。作为文化理解的方法,通过秉持“东亚普遍性”的志

① 石川九楊:『漢字がつくった東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2007年,第233—234頁。